

长安史话

宋元明清·民国

主编 张铭浩
副主编 刘文瑞





长安
史话

下
宋元明清·民国
册

陕西旅游出版社

《长安史话》编委会

顾 问：史念海 林剑鸣 牛致功
李之勤 张 扬

主 任：武伯纶

副主任：张铭洽 刘秉政 刘文瑞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世平 王巨川 刘文瑞 刘秉政 卢 鹰
武伯纶 张文立 张铭洽 张小平 周生玉
贾二强 唐洪乐 常腾蛟

目 录

● 宋元明清

漫谈宋元明清时期的西安	1
北宋与西夏在陕西的对峙	8
爱国宰相寇准	13
北宋名臣吕大防	19
书道渊藪与文化宝库	24
张载与宋代关学	29
平民山水画大师——范宽	33
宋敏求与《长安志》	37
苏东坡与凤翔东湖	41
耀州窑	46
保卫川陕的重要战役	52
忽必烈在关中与安西王府的兴废	58
祖庵与全真教	63
明代的西安城墙	68
朱棣与秦王府	72
西安钟楼和鼓楼	75
漫话西安清真寺	81
一代权阉刘瑾	88
弘治状元康海	93

戏曲大家王九思	98
冯从吾与关中书院	103
科技之星王微	107
泾阳崇文塔	112
蓝田水陆庵	116
关中大地震	120
明末陕西农民大起义	123
大顺农民政权定鼎西京	128
清代西安城区的布局特色	134
顾炎武在关中的交游	140
关学大师李二曲	146
乾隆状元王杰	152
毕沅与《关中胜迹图志》	157
关中农学家杨岫	162
农业经营家杨秀元	168
鸦片战争与西安	175
林则徐在西安	179
王鼎的悲剧	183
太平军、捻军在关中	187
清末关中的回民起义	193
戊戌维新志士宋伯鲁	199
慈禧太后在西安	204
赵舒翘之死	210
陕西咨议局	215
近代关中的新式学堂	218
秦腔源流漫谈	226

● 民 国

漫谈近现代的西安	233
辛亥革命时的西安起义	237
井勿幕与陕西同盟会	243
辛亥功臣张凤翔	250
草莽英雄张云山	255
豪侠仗义、威震关中的“刀客”	261
白朗起义军过陕西	265
陆建章督陕始末	269
“古调独弹”的易俗社	273
一代英豪胡景翼	278
陈树藩督陕	285
西北护法的旗帜——陕西靖国军	292
一代风流——于右任	298
五四运动在西安	306
陕西最早的中共党组织	312
“二虎”守长安	315
刘镇华祸陕	322
冯玉祥三进西安	329
魏野畴与大革命时期的关中	336
大革命时期的关中农民运动	340
渭华起义	347
民国十八年“年馑”	352
邵力子在西安	358
“四二六”驱戴反日斗争	362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366
力挽狂澜，功垂青史	375
永垂不朽的爱国志士杨虎城	383
民族功臣张学良	393
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	403
红色桥梁	412
不朽的战士不朽的歌	417
抗日名将关麟征	422
举步维艰的近代关中公路建设	428
李仪祉与关中水利	435
西安第一座现代企业	441
抗日战争中兴起的西安工业	445
历经沧桑话西大	452
关中才子——杨钟健	459
“西北王”胡宗南	465
民主斗士杜斌丞	473
奇园茶社	479
关中解放的序曲——西府战役	483
扶郿战役与关中解放	487
古都的新生——西安解放	492
西安地区大事表(三)	498
后 记	1

小资料

金石学家吕大临	23
史斌长安遇害	32

张戟墓与祠	62
西安八仙庵	67
三原城隍庙	92
回族学者胡登洲	97
大观圣作之碑	111
淳化秘阁帖	115
关中学者马理	119
明清民居建筑的“活化石”	139
关中八景图	167
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	174
王维画竹石碑	182
“天下第一仓”	198
李芳桂之死	230
于右任的化名	249
陕西电话局的成立	254
张奚若小传	277
张幕陶不是托派汉奸	311
陇海铁路陕西段的修筑	335
民国西安行政建制沿革	346
于右任“贿选”副总统	351
宋哲元凤翔屠俘记	440
农民诗人王老九	458
人民外交家王炳南	482

· 小 故 事 ·

司马光长安反新法	12
----------------	----

杨爵直言遭监禁	133
康熙在西安	151
华山道士修公路	260
蒋纬国一怒杀赌徒	392
赵寿山寓教于“筷”	434

民间传说

宋伯鲁妙对解难	203
---------------	-----

诗文欣赏

忆樊川	(宋)寇准	18
题楼观授经台	(宋)苏轼	45
送秋马上始见终南	(宋)韩琦	57
题潼关	(明)李梦阳	71
骊山行	(清)顾炎武	145
寄题韩城子长墓	(清)李因笃	156
马嵬怀古(十首选一)	(清)毕沅	161
题杨太真墓(八首选二)	(清)林则徐	178
哭故相王文恪公	(清)林则徐	192
劝桑歌	(清)杨岫	214
题井勿幕小照	于右任	284
中吕·醉高歌		
闻日本乞降，作中华乐府十首(选其一)	于右任	444
抗敌歌	孙蔚如	497

长安史话

宋元明清

主编 张铭洽
副主编 卢鹰



漫谈宋元明清时期的西安

李之勤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从公元10世纪到20世纪初年的宋元明清时期，处于封建社会的后期。从全国的范围来讲，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较之封建社会前期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南方长江流域发展得更快，水平也逐渐超过了长期领先的黄河流域。手工业的兴盛，商业的繁荣，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一些地区和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政治和军事方面来说，这个阶段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也比以往各个时期更为复杂而激烈。先后兴起于北方的三个少数民族：契丹、女真和蒙古的统治者，分别建立起了辽、金、蒙古及元和清等强有力的政权，他们南下进占了黄河流域，甚至建立起了统一全国的王朝。金朝灭亡北宋、蒙古灭亡金朝、元朝灭亡南宋、清朝取代明朝等一次次改朝换代的战争，以及北宋与辽和西夏，南宋与金和蒙古的长期对峙和互相交兵，都使中原地区较之南方经受了更多的摧残，而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相互联系和融合也在同一时期达到了更高的阶段。对外关系方面，在长期和平交往之后，先有蒙古帝国的远征西亚、东欧，继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海上东来，使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面临新的问题和严峻的考验。

这种形势，也使长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是10个王朝的京城、并且作为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000多年之久的长安，因为宋元明清时期全国政治中心的东移而丧失了首都的地位，



其政治经济地位随即下降，大非昔日可比，这是很明显的，也是很自然的。宋元明清时期的长安与东南地区相比，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也逐渐落后了。但是，在宋元明清时期的八九百年当中，西安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还是在曲折的道路上有所前进的，而且在新时期的新形势下，西安负担起维系祖国西北和西南广大地区、保证西部稳定、屏障中原安全的重任，并因此始终受到建都东部的宋元明清各朝统治者的极大重视。在宋金时朝，西安一直被称为京兆郡或京兆府，地位高于其他郡治府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始改京兆府为安西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正式将安西路改为西安府。从此，“西安”这一令人歆羡的嘉名便永载史册，沿用至今。

下面，我们再详细谈谈宋元明清时期的西安在军事政治方面的重要性。

宋元明清时期西安的军事政治地位是很重要的，这可以从各朝统治者的军政设施中得到充分的证明。

北宋前期，地方第一级行政区中有陕西永兴军路和秦凤路。永兴军路的辖境包括今陕西省关中、陕北的大部分地区和山西省、河南省的一部分地区，治所就设在西安市，当时称为京兆府、永兴军。永兴军一名是由唐代节度使辖区演变而来的，相当于后代军事管辖区的名号。唐代首都是不设节度使的。唐末昭宗被胁迫迁往洛阳后，京兆附近的军事管辖区被称为佑国军。五代的后梁改为永平军，后唐复称长安为西京，不立军名。后晋改以洛阳为西京，改长安军名为晋兴军，后汉改称永兴军，后周和北宋都沿用这一名号，未加改变。从这些军名及其变化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者对西安的军事地位是十分重视的。其后北宋与兴起于陕北、内蒙古一带，势力日强，建都银川的党项羌西夏政权多次争战，长期对峙。陕西永兴军北部被分出两个名叫鄜延路和环庆路的军区，秦凤路西北也分设了两个名为泾原路和熙河路的军区，以加强对西夏的攻守力量。京兆府实际上成为支援各路军事的主要基地。





金朝灭亡了北宋以后，开始了西北与西夏对峙、南与南宋争衡的局面。因而金朝不仅把京兆府视为对抗西夏的重镇，更作为与南宋争夺汉中和四川的主要基地。并以关中的长安和凤翔为根据地，接连发动了和尚原、仙人关、饶凤关等多次有名的大战。

蒙古窝阔台汗夺取关中后，派其弟拖雷假道南宋的汉中、安康，包剿扼潼关、黄河之险以阻蒙古东进南下，以图保河南安全的金军主力。禹县三峰山大战后，金朝不久就被迫放弃了首都汴梁，南迁秦州，为蒙古南宋联军所灭亡。蒙哥汗时期，划京兆为其弟忽必烈的封地，作为经营四川、青海、西藏甚至云南的基地。而忽必烈在当上元世祖的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就立即设置秦蜀行中书省(也称为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其治所就设在京兆府。即令是分设了四川行中书省以后，陕西行省的管辖范围也包括了今陕西全省、兰州以东的甘肃省大部和宁夏、内蒙古各一部。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忽必烈封其第三子忙哥剌(正后所生，长子早卒，次子真金被立为皇太子)为安西王。安西王拥兵15万，分驻京兆府和六盘山，兼辖河西、吐蕃、四川等处军民之政，位高权重，冠于诸王。

明朝初年，也以西安为北抗元朝残余势力，南图四川的军事重镇。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封其次子朱橚为秦王。其后在讨论建都地点问题，分析南京、临濠、开封、洛阳和长安优劣时，朱元璋也认为“天下山川，惟秦地号为险固”，特命皇太子巡视关陕。而作为明代第一级地方行政单位的陕西布政使司(相当于现在的省)，其辖境实包括今陕西省全境和嘉峪关以东的甘肃，以及青海东部、宁夏东南部、内蒙古南部各地。

清军入关，统一全国之后，分命满、蒙、汉军八旗，镇守各省要地。陕甘省驻兵达八万多人，在各直省驻兵数目中占第一位。其他15省区驻军总数才50万人。如以具体城市而论，西安城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中也是八旗驻防时间最早、驻兵数目最多的一个。早在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西安府即与江宁府同时分驻右、左四翼满、蒙、汉军八旗劲旅各2000人。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



年)，西安驻防八旗骑兵7000多名，步兵700多名。将佐和铁匠、弓匠以及眷属等还不在此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又增至8600多名。乾隆末年，定额西安将军所辖各级将官约400多人，骑兵、步兵、炮兵共2700多人，养育兵7000多人，铁匠、弓匠90多人，总数在万人以上。在全国各大城市中驻军数目最多。八旗之外，清朝的又一主要军事力量叫绿营。清初绿营兵屯驻的分区状况，也是以驻扎在西安的川陕总督辖境最广，统兵众多。他不仅统辖陕西、四川和甘肃等省的驻军，而且还一度兼辖山西省的驻军。到乾隆年间，始定以陕甘总督驻兰州之制。

上述宋元明清各朝关于军政方面的设施，可以看出历代统治者对西安的重视。其所以如此重视，自然是由于西安在维护全国安全与稳定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缘故。

在城市面貌和经济文化方面，宋元明清时期的西安也有相当大的变化。

从城市面貌来说，唐末朱温迫使唐昭宗迁都洛阳时，长安的城池、宫殿、衙署和民居都遭到严重的破坏。驻防长安城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为了便于防守，不得不放弃外郭城和宫城，在皇城的基础上改建了长安城，当时称为新城，面积仅相当于原来长安外郭城的1/16，连长安和咸宁两县的衙署也被分别留在城外东西两侧，宋、金和元朝的京兆府、安西路或奉元路，都以这个新城为治所。不过元朝又在新城东北数里处，建造了一座辉煌壮丽的安西王府。亲眼见过这个王府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介绍说，京兆府“城外有王宫，即上述大汗子忙哥刺之居地。宫甚壮丽，在一大平原中，周围有川湖泉水不少，高大墙垣环之，周围约五里。墙内即此王宫所在，其壮丽之甚，布置之佳，罕有与比。宫内有美丽殿室不少，皆以金绘饰。”明代初年，又把宋、元长安城墙分别向东、向北扩展了各约1/4，并于城内东北部兴建了规模很大的秦王府，其中“宫殿轩敞，川原亭池，极一时之丽观”。其后又把钟楼从迎祥观旧址迁建到现在的地方，使居于通往东西南北四门大街的中心点上，奠定了今天西安城的基本格局。





清朝则把原来的秦王府拆迁修建了城隍庙，就其故址扩大到北大街和东大街以及北面和东面的城墙，作为八旗驻防的满城，面积约占西安城总面积的1/3，连钟楼和东门都包括在内。此外，还在东门内的东大街之南修建了一个汉军八旗的驻防城，后来由于汉军调防而废弃了。

关于宋元明清时期西安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情况，史籍记载不详。但从下述几点也可以推测其大概。《宋会要辑稿·商税杂录》载有北宋时期全国各府州及其所属县镇场务年商税收入统计，其中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以前，京兆府在长安城及各县(相当于现在的西安市及西至乾县、武功、户县，东至临潼、蓝田，北到泾阳、高陵，南到柞水、镇安各县)场务的商税年收入额为56000多贯，在全国各府州中居第17位，在黄河流域各府州中居第10位。熙宁十年，京兆府的商税收入额上升到83000多贯，跃居全国各府州的第11位，黄河流域的第五位。如果不算各属县场务而以各府州所在城，也就是治所的每年商税收入额而论，熙宁十年长安城的商税收入额为38000多贯，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中居第16位，在黄河流域各城市中居第五位。这说明北宋时期西安地区的商业发展水平，不仅在全国各府州、城市中仍处于先进行列，而且其发展速度仍然也是名列前茅的。商业的繁荣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大致情况。元代西安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情况，马可·波罗在其著名的游记中描写道：“离上述之哈强府(当为河中府，即今山西永济县的蒲州故城)城后，西向骑行八日，沿途所见城村，皆有墙垣。工商发达，树木园林既美且众，田野桑树遍布，……土产种种，禽鸟不少，可供猎捕、畜养之用。骑行上述之八日程毕，抵一大城，即前述之京兆府是也。城甚壮丽，为京兆国之都。……惟在今日，则由大汗子忙哥刺镇守其地。……此城工商繁盛，产丝多，居民以制种种金锦丝绸。城中且制一切武器。凡人生必须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由此可见，宋金元时期，西安地区的种桑养蚕和丝织业仍具有相当的规模。但在此后，蚕桑和丝织业就大大衰落





了。这种变化除政治、军事、经济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元代初年起，关中地区开始引种棉花，并很快得到推广，种桑养蚕和丝织业逐渐为植棉纺织业所取代。这对明清时期西安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和变化，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曾在陕西做官的张瀚在其所著的《松窗梦语》中介绍西安地区的商业情况说，关中“山河四塞，昔称天府，地方驴马牛羊，旃裘富丽，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去齐鲁，往来贸易，莫不得其所欲”。清代更是“城内辐辏交午，阘阘崇比”，“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子午峪、石鳖峪道通兴汉，商贾络绎。市多榷酤，最易藏奸”。至于西安府城商业区的分布，则是明代集中于城内的西部，清代又发展到东关。

人口增减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一个城市的经济盛衰，商业荣枯。而宋元明清时期西安人口的发展过程，也是几经起落，变化巨大。据统计，唐代极盛时期的玄宗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有人户八万，京兆府有户36万，口196万。经过唐末五代战乱，北宋初恢复，到宋神宗熙宁年间，长安城的户数已有“数万家”。京兆府的总户数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为九万多户，宋神宗熙宁年间为11万户，元丰年间为29万户，徽宗崇宁年间为36万户，已相当于盛唐时期的水平了，西安地区100年间人口增长了三倍，说明其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其后，宋金交兵，关中残破，户口凋零。金朝时在黄河流域的统治比较稳定，在户口最盛的金世宗大定年间，京兆府12县的户数将近10万。金元时期，战争更加频繁而激烈。蒙古蒙哥汗在位时期，比唐代和宋代的京兆府辖区大一倍的奉元路才有三万多户，27万口。同时期的另一统计资料则说关中“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可见户口损耗之甚。从元代到清初，和全国发展的总趋势一致，西安地区的人口也有几次回升、下降、再回升、再下降、又回升的曲折过程。康熙年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以后，西安地区户口增加的趋势更加明显，到乾隆时期，共治西安府城的长安、咸宁两县已有男女大小近60万口。嘉庆时期变为八万多户，53万多口。道光初年又回





升到57万多口。光绪末年降为37万多口，宣统年间又回升为10万多户，近50万口。其间两次下降，当与清朝统治者镇压白莲教起义和回民起义的战争与各项暴政有关。总的看来，西安地区户口数字的升降起伏，也是与当时全国户口升降的总趋势、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以及西安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的。

谈到文化方面，宋代是理学兴盛时期，著名的濂、洛、关、闽四大家中，关学的创始人就是籍属长安的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其后关学也代有传人。文学方面，明末武功康海、鄠县王九思都以音乐和戏曲知名。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元代马可·波罗曾谈到西安居住着“一些基督教徒、土库曼人和撒拉逊人”。明代末年，西洋耶稣会教士东来，曾在西安城内建筑教堂，传播天主教，足迹甚至远至关中和陕南的偏僻山区。久居三原和西安的泾阳著名科学家王微，就信仰了天主教，并向耶稣会教士学习了拉丁语和西洋科学技术，翻译《远西奇器图说》，编印《西儒耳目资》，撰著《诸器图说》、《诸器图说小稿》、《藏器图说小稿》和《畏天爱人极论》等书，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总之，在宋元明清时期，已经失去了首都地位的西安，在全国的政治、军事地位仍然是极其重要的。西安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也都是有所发展的。当然，就其发展的趋势、发展水平和在全国的地位而论，的确是既比不上秦汉隋唐时期的长安，也逊色于东南地区的一些新兴的城市了。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历史由古代转到近代的征途时，西安就显得有些起步较晚、起点较低、发展速度也比较缓慢了。